

张一弓 获奖小说集

死吻

SIWEN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死

吻

张一弓获奖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死 吻
——张一弓获奖小说集
张一弓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6插页 255 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54—0166—X

I·146 定价: 4.00 元



张 一 弓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祖籍河南新野。从事记者工作三十余年。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一九八〇年以来，出版了《流泪的红蜡烛》、《火神》、《张一弓集（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等中、短篇小说集五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副主席。

序

田中全

从来只听说非名人请名人为他的著作写序，没听说过名人请非名人为自己的书写序的。然而，这件“反常”的事却让我给碰上了。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的作家张一弓，偏要我这个不知何许人也的无名编辑，在他的重要集子《张一弓获奖作品集》前面写上一段话。我真是惶惑之至。然而惶惑之后，我还是汗颜应承了。

可是“序”什么？“序”他的作品吧，从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打响以来的七八年间，关于他的小说，大大小小的评论家，已经发表了不计其数的长长短短的评论文章，我一时也无更多新话可说。那就也打破作序的常规，少“序”他的作品，多“序”他这个人，“序”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给我的印象吧。

一弓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谦和，名人而无名人气。说一件意义非小的小事吧。

去年初，一弓路经湖北，我们《当代作家》编辑部的同仁略尽地主之谊作了接待，并为他办了一点小事。其时，刊物刚刚创办，局面尚未打开，当然是极想名家惠赐大作的。然而，考虑到以一弓的盛名，树大招风，定然是文债猬集，不便开口约稿。孰知一弓在武汉停留了几天，我们准备送行的时候，他却主动向我们提出，他有一个自己心爱的酝酿已久的中篇构想，

写好后给《当代作家》。并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回河南去写，还是就留在这里把它写好？如果回河南，就怕应酬多，时间上难以保证。我们一听，自然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当即坚留一弓在汉把小说写成。一弓应允了，但却要我们答应一个“条件”。我们想，只要能得到他的佳作，只要力所能及，管他什么条件，我们认了。但又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条件”却是给换一个便宜一点的住处。他说，他现在住的汉口饭店，收费太高。如果长住下来写东西，想到一天要《当代作家》付出二十五元的房租，于心不安，很难把作品写好。我听了大受感动。在我有限的见闻中，不管是大名人也罢，中名人也罢，小名人也罢，甚至昨日无名而今日刚刚为世人所知者也罢，有那么一些是颇讲究包括住房在内的接待规格，只怨其低，不嫌其高的。他们自觉为刊物或出版社写东西是一种恩赐，一种俯就，言谈举止间满溢着一种骄傲，一种托大，哪里还会这么知疼着热地为对方着想呢！

一弓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写作态度的严肃。

他主动提出给《当代作家》写的那个中篇，就是后来发于该刊1986年第3期的《死恋》。这篇不到四万字的小小说，他在武汉写了约一个月才完成初稿。回到河南后又花了上十天的时间，精心修改定稿，托人带来武汉。每天平均只写千余字，真是绞尽脑汁，“不惜血本”。而且他还绝非客套地表示，如果编辑部看后有什么意见，可以商量再作修改。

我这里如实介绍一弓写作《死恋》的进度，并和写作态度的严肃联系起来，绝非认定唯慢工方出细活，凡快手定出粗文。自古以来，马工枚速皆可写成华章，我当然清楚。然而，也还是在我有限的见闻中，也还是不管大名人也罢，中名人、小名人也罢，确有那么一些，只求又多又快又省而不求精，下笔不能自休。稿子到了编辑手里，不单水份很大，并要给他作字句上的、语法逻辑上的颇多加工，甚至还要帮他改正颇多的错别

字和不当的标符。然而，这还算好的，因为个别名人还不让你动他的大作——包括错别字的改正呢！你说，这个字写错了，他硬说没错。把字典给他看，他说字典上的写法看着不舒服。真令编辑哭笑不得。而一弓交出的以平均每天千余字的进度写成的《死恋》，不谈它的深而且新的思想内涵，不说它的诗化的精炼的笔墨，单从语法、逻辑、文字、标符上看，也是很严谨的，几乎使编辑在整稿时失业了。

而且，一弓的字迹娟秀工整，稿面干净，这也是极难得的，这同样表现着他的名人而无名人气，表现着他对我们这个编辑行业的尊重、体贴，知疼知热。看到一弓的手稿，我的脑子里又不自觉浮现出名气比他只小不大，甚至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些作者的手稿。那是些怎样的手稿呵！有的近于天书，字迹极难辨认，编辑要时不时给添添改改，怕排字工人捡错；有的标符颇为“朦胧”“多义”，欲顿还逗，似逗似圈。还有的竟用铅笔写稿！——名人派头可谓足矣。

现在简单谈谈一弓的小说。

他的小说有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股使人的灵魂为之颤栗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于他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家总是深切关注重大的、尖锐的、敏感的社会问题，并给以勇敢而真实的揭示。因此，他的作品能和关注中国历史和中国前途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发生强烈共振。

他的成名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是第一次尖锐地触及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民因左的失误而成千上万地挨饿、逃荒乃至变相抢粮的历史大悲剧，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考验》，写一个十五岁即参加革命军队，十八岁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数十年如一日履险犯难、忘我工作，堪称优秀党员的女青年，仅仅因为有一个海外关系，只能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故事就到此结束，我们也司空见惯了，听多了，不

会引起太大的震动。但令人感到格外揪心和痛楚的，是主人公芳菲“晚年”的“幸运”——她终于要被指定神速吸收入党了——入党的阶梯竟然还是她那个海外关系，亦即几十年横在通向党的大门口的障碍。人的价值在其自身这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为什么被我们这样忽视和嘲弄，酿成生活中的许多悲剧呢？

《流星，在寻找它失去的轨迹》，通过一个正派朴实、勤劳能干的青年农民的心灵扭曲和变异，使读者震撼于极左路线对中国农民造成的深层创伤。同时也警示世人，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也不可忽视灵魂工程的建设。

《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戛斯》、《死吻》等篇，也都莫不触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表现出这种强大的震撼力。

近年来，创作和评论中有一种淡化生活（我弄不明白，生活怎么分浓淡，又怎么使“浓”的生活变“淡”？）、淡化主题的思潮，还有一种泛写一般人际关系以保持作品的永恒的主张。如果这种思潮、主张不具备排他性，作为百花中的一花，百家中的一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不想妄加否定。但如果奉此为文学的主臬，有意无意地贬抑勇敢地揭示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和重大矛盾中的作品，以为它们急功近利，缺乏生命力，我就不敢苟同了。当然，我并不一般地膜拜社会问题小说。那种内容上既缺乏深沉凝重的思考，缺乏高出于一般读者的见识，人物形象单薄苍白，只是作者揭示社会问题的道具的小说，委实是倒人胃口的短命货。只要“问题”过去，“问题”解决，这种小说也就从读者脑中消失了。但一弓的小说与此类一次性产品绝缘。不谈别的，单凭它们所塑造出的那些鲜明生动、迥然独特的人物形象，就将长时间地留存在读者的心中。

一弓的小说还注意了文学性和可读性的结合。照说，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文学性和可读性不应成为一对矛盾。但是，近年来却实际上出现了文学性和可读性分离的状况。一些

被评论界所称道的所谓纯文学探索性小说，一反传统的小说概念，不讲究故事情节，手法怪异，甚至长段长段地不打标点（这是新探索还是复旧？），以致读者寥寥。而相当数量的通俗小说，则专事情节故事的离奇编造以投合低层次读者的欣赏习惯，虽暂时获得了较多的读者，却谈不上有什么美学价值。正如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所言，纯文学向天上飞，俗文学向地下钻。一弓也在飞，从他的若干篇小说可以看出，他在追求尽可能高的美学价值，追求诗情，在突破小说的一些传统程式，适度采用时空跳动，历史回叙和现实描写、人物行为和意识流动交替进行等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段。但他没有飞到天上去，没有飞到一般读者高不可及的九霄之上。他没有忘记，起源于人们劳作之后的休息，起源于这种休息中的谈天讲故事的小说，本是属于群众的。因此，种种现代手法的采用，没有妨碍他对独特的新鲜生动的故事情节甚至戏剧性的讲究。这就保证了他的小说的可读性。以致有的小说还被改编为属于大众化艺术的电影而搬上银幕。

既获得评论家的青睐，又能走到群众中去，看门道者和看热闹者均表欣赏，这是难得的好事，是一弓的成功。这么一条创作之路，我想一弓会继续走下去的。

1987.12.13.

目 录

序..... 田中全(1)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1

张铁匠的罗曼史..... 48

春妞儿和她的小夏斯..... 116

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 173

黑娃照相..... 257

寻 找..... 271

考 验..... 284

死 吻..... 318

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

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 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一九六〇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暖暖暖暖……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掙要饭篮，暖暖暖暖……”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象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象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一九五八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此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象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剃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神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

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四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划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划了三个象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要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懑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牛，牛，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心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好象一把刀刺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家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方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肉，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地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象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看下去，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拉起来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让自己听见那“哞哞”的牛叫声，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将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牡牛，向组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拴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子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下，摔了八瓣。“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铺盖搭在牛背上，骄傲地牵着牛在村里游行，拐弯抹角走了四四一十六